

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劳动份额的作用机制

——基于面板三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谢洪军, 牟家莹, 李扬武

(重庆理工大学 经济金融学院, 重庆 401320)

摘要: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从微观层面运用面板三重差分模型(DDD)对增值税转型的效果进行了测算,发现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劳动份额,并且显著降低了政府份额。为了探索其内在机制,基于收入分配的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存在两方面的效果,一是增值税转型降低政府份额,政府份额下降有利于增加劳动份额。二是增值税转型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实证研究发现第二种效果大于第一种效果,最终降低了劳动报酬。研究补充了增值税改革的经验,为2015年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评价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增值税改革; 劳动份额; 三重差分; 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17)10-0113-06

1 文献回顾

近十年间,中国已经实行了两次增值税重大改革,改革的影响深入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增值税转型是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成消费型增值税,两种增值税的核心差异是对公司购进固定资产的增值税是否允许在当期进行抵扣。在我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的压力下,政府期望通过增值税转型来达到刺激投资、扩大产能的效果,但就对增值税改革实施来讲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负面影响。劳动要素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会引发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如劳动份额的降低会恶化贫富差距^[1],劳动份额的下降会抑制消费潜力的释放^[2]。本文在检验增值税改革对降低企业税负和降低劳动报酬方面的效果后,希望揭示增值税改革对劳动份额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对相关的政策调整做出参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聂辉华的研究较早提出增值税转型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增值税转型显著减少企业雇佣人数^[3]。陈烨、张欣等也研究认为增值税转型可能造成新增失业^[4]。石光、岳阳的研究进一步测度了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5]。但是申广军、陈斌开、

Nissim 研究认为增值税转型通过减少赋税促进就业^[6-7]。在增值税改革对劳动份额的作用究竟是负向还是正向的问题中,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

一些学者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聂辉华研究认为增值税转型造成了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企业雇员,从而减少劳动份额^[3]。石光、岳阳则研究认为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的影响除了上述渠道还存在另一种重要渠道,即是增值税转型造成工资总额的下降^[5]。本文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同于上述文献,是基于初次收入分配利益三方的相互作用的视角。同时,国内学界的传统认识是增值税转型会减轻企业资本赋税^[4],本文将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面板三重差分模型测度其影响。增值税转型导致资本替代劳动只有个别学者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也扩展了这方面的研究。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增值税转型后允许企业对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进行抵扣。增值税转型对劳动要素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增值税转型减税引起生产成本下降,促进固定资产投资引起企业规模扩大,从而雇佣人数上升;

收稿日期:2017-06-15

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加快西部创新中心建设发展研究”项目(2016Q99)。

作者简介:谢洪军(1974—),男,四川广安人,重庆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牟家莹(1993—),女,重庆长寿人,重庆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李扬武(1993—),男,湖南岳阳人,华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

二是增值税转型降低企业购买固定资产的成本,促使企业在生产中用资本代替劳动。前者称为支出效应(也称产出效应),后者称为替代效应^[4]。本文随后将提出假说 1 和假说 2,分别对应着以上两种作用途径。

增值税转型试点使用的是增量抵扣,只有在本年应交增值税大于去年应交增值税时,才能抵扣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税,因此没有引起政府的增值税收入大幅下降,但是由于 2005—2008 年中国工业有整体增长的趋势,整体上企业的生产税占增加值的比例(政府份额)会下降。因此本文认为增值税转型会减轻企业资本赋税。

增值税转型背景下,减少政府份额会让出一部分企业增加值,由于存在“增加值_i=资本所得_i+劳动所得_i+政府所得_i”的关系根据参与分配三方的关系,这部分转让的增加值将在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之间分配,劳动者可以从中分得增加值,此外资本也可分得增加值。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增值税改革降低政府份额,政府份额下降增加了资本份额与劳动份额之和。

相当多的研究都认同增值税转型对固定资本投资的促进。如聂辉华等^[3]、Chen^[8]、申广军和陈斌^[6]、Lin^[9]认为增值税转型的税收减免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企业对劳动的投入相对下降。整合上述理论我们得出如下假说:

假说 2:增值税改革会加剧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企业资本份额提高。

已经有多篇文章如陈烨、张欣等提到了增值税转型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加强的问题^[4],然而这方面的实证研究比较缺乏。聂辉华通过实证检验替代性的加强^[3],但他是通过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之比来测度替代性,不是初次收入的视角,无法完全解释劳动份额的下降。

验证了两种效果的存在,还需完整描述增值税转型影响劳动份额的作用途径。利用三重差分模型,本文将对两种效应分别进行测度和比较,来揭示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作用过程,由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增值税改革中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大于政府份额下降的收入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劳动份额下降。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与变量

双重差分方法(DID)通过比较试点企业 and 非试

点企业转型中呈现的不同行为特征,不仅能测算出公共政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还可以一定程度上去除其他因素对结果的干扰。由于试点企业的识别包括了省份、行业、时间三个变量,本文使用扩展的双重差分模型,即三重差分(DDD)模型,三重差分模型已经被付明卫、叶静怡等较早使用^[10],此外我们还使用加入行业时间趋势和地区时间趋势的固定效应模型,以控制除控制变量以外某些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对因变量的影响。

为考察增值税转型对企业劳动份额的影响,采用面板三重差分的方法建立模型 1。此模型和本文其余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 husman 检验选择了固定效应模型。为了揭示增值税转型对政府份额的影响,将 1 式因变量 ls 换成 gs 来考察,变换后的模型本文称 2 式。

$$ls_{first} = \alpha + \beta_1 \cdot rp_r \times ri_i \times after_t + \beta_2 \cdot rp_r \times after_t + \beta_3 \cdot ri_i \times after_t + \beta_4 \cdot rp_r \times ri_i + \beta_5 \cdot rp_r + \beta_6 \cdot ri_i + \beta_7 \cdot after_t + \beta_8 \cdot size_{f_i} + \beta_9 \cdot dar_{f_i} + \beta_{10} \cdot roa_{f_i} + \sum_{m=1}^M [1(i=m) \cdot year_i] + \sum_{n=1}^N [1(r=n) \cdot year_i] + \sum_{k=1}^P id_k + \epsilon_{first} \quad (1)$$

式(1)中劳动份额 ls 等于(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应付职工福利贷方累计)/企业增加值,分子表示劳动报酬,衡量劳动要素分得企业经营成果的大小;资本份额 cs 等于(本年折旧+营业利润)/企业增加值,衡量资本要素分得企业经营成果的大小;政府份额 gs 等于(应交增值税+管理费用中的税金)/企业增加值,其中分子为生产税净额,衡量政府分得企业经营成果的大小;哑变量 rp 为 1 表示企业属于试点的省,取 0 时表示企业属于非试点的省;哑变量 ri 为 1 表示企业属于转型行业范围,为 0 表示企业不属于转型行业范围;政策年哑变量为 $after$,若企业处于增值税转型试点后(2004 年后,不包括 2004)取 1,否则取 0。

交互项 $rp \times ri \times after$ 衡量了增值税转型后企业劳动份额的变化,其系数 β_1 是我们最关注的参数,数学上,它等于处理组在政策变化后的差异减去对照组在政策变化后的差异。若 β_1 显著为正,表明控制相应因素的影响后,增值税转型提高了劳动份额,显著为负就表明降低了劳动份额。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没有转型试点,由于试点的八大行业多是传统重工业、国营企业分布多,国企转型改革政策多,具有和其他企业的明显差异,模型中交叉项 $ri \times after$ 的系数 β_3 捕

捉了这一区别,也就是说 $ri \times after$ 控制了改革行业改革后的特征,如果不控制交叉项 $ri \times after$ 我们会错误地将国企改革的影响归结到增值税改革中,导致有偏的估计。此外模型还控制了 DDD 模型中所有的交叉项,控制了与改革三变量相关的各种差别。同时,模型还控制了变量 $size$ 企业规模,用总资产的对数表示。控制了变量 dar 资产回报率和变量 roa 资产负债率。

$\sum_{m=1}^M [1(i=m)year_i]$ 表示每个行业的线性时间趋势,能反映出行业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差异,其中 $1(i=m)$ 是虚拟变量,对第 m 个行业赋值为 1,否则为 0; $year_i$ 是年份, M 表示总共有 M 个行业。同理 $\sum_{n=1}^N [1(r=n)year_i]$ 表示每省份的线性时间趋势,能反映出企业所在省份随着时间变化的趋势差异,共有 N 个省份。 $\sum_{k=1}^P id_k$ 表示个体不随时间变化的效应,代表不可观测的个体特征, P 表示总共观测企业 P 家。 ϵ 为其他影响因变量的不可观测因素。

为了检验假说 1 我们还需要考察政府份额对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的影响,建立模型 3:

$$re_{fi} = \alpha + \beta_1 \cdot gs_{fi} + \beta_2 \cdot size_{fi} + \beta_3 \cdot dar_{fi} + \beta_4 \cdot roa_{fi} + \sum_{m=1}^M [1(i=m)year_i] + \sum_{n=1}^N [1(r=n)year_i] + \sum_{k=1}^P id_k + \epsilon_{fi} \quad (3)$$

re 是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之和,衡量政府参与收入分配后剩余的经营成果。3 式中其他变量意义同上文,如果 2 式中 $rp \times ri \times after$ 系数显著为负,3 式中 gs 系数显著为负,假说 1 得到验证。

为了探究减税的福利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如何分配,需要测度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建立模型 4:

$$ls_{firt} = \alpha + \beta_1 \cdot rp_r \times ri_i \times after_i \times cs_{fi} + \beta_2 \cdot rp_r \times after_i \times cs_{fi} + \beta_3 \cdot ri_i \times after_i \times cs_{fi} + \beta_4 \cdot rp_r \times ri_i \times cs_{fi} + \beta_5 \cdot rp_r \times cs_{fi} + \beta_6 \cdot ri_i \times cs_{fi} + \beta_7 \cdot after_i \times cs_{fi} + \beta_8 \cdot gs_{fi} + \beta_9 \cdot cs_{fi} + \beta_{10} \cdot size_{fi} + \beta_{11} \cdot dar_{fi} + \beta_{12} \cdot roa_{fi} + \sum_{m=1}^M [1(i=m)year_i] + \sum_{n=1}^N [1(r=n)year_i] + \sum_{k=1}^P id_k + \epsilon_{firt} \quad (4)$$

式(4)这类模型被一些学者用来研究政策冲击对两个经济变量相关性的影响(2015)^[18],4 式中交互项 $rp \times ri \times after \times cs$ 衡量了增值税转型后企业资本份额—劳动份额的系数变化,其系数 β_1 的正负表示

增值税转型造成资本份额—劳动份额系数的变化方向。若 4 式中 $rp \times ri \times after \times cs$ 的系数显著为负且 cs 的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增值税转型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3.2 数据与样本

从 2004 年 7 月 1 日起,黑龙江、吉林省、辽宁省和大连市装备制造业、石化工业、冶金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农产品加工业、军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八大行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为增值税改革试点对象。把这次试点作为自然实验,本文构建了 1999 年至 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搜集整理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China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y, CASI)。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包括了工业企业中所有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的口径基本一致。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和缺乏财务管理能力,规模以下的民营企业财务报表难以如实反映企业情况,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样本不包括这部分企业。本文选择了 2004 年增值税试点而没有把 2008 年中部试点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 2008 年发生了国际金融危机,企业资本结构和政府行为会发生变动,可能对增值税转型的效果识别产生混淆。为了比较企业试点前后的差异,试点前应当存在足够的有效观测期,因此本文没有把 2009 年全面推广增值税转型作为事件年。数据通过筛选,最终的观测数为 1 137 577 个,从 1999 年到 2007 年共有 9 个截面,每个截面企业数目从 71 063 到 214 222 不等。

4 经验研究结果与讨论

4.1 经验研究结果

表 1 显示了各模型实证检验结果,结果显示 1 式的关键变量 $rp \times ri \times after$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工业企业的劳动报酬份额,与石光、岳阳的发现一致^[5],而我们得出的结果是,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增值税改革引起了劳动份额平均下降 0.008,从参数估计值来看,作用幅度相对较小,但考虑到全国工业企业总增加值,增值税转型造成的劳动报酬的下降是巨大的。由于行业、地区、年份等哑变量的系数没有明确的经济涵义,因此表 1 中我们没有报告。

2 式的回归结果显示关键变量 $rp \times ri \times after$ 系数在样本中显著为负,增值税转型造成了政府份额平均下降 0.009,这表明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政府份额,这与我们的预期相吻合,表明增值税改革确实发挥了减轻企业税负的作用。中国的工业发展到了中

后期,增速有所放缓,政府实施的增值税转型在刺激工业增长方面显然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表 1 增值税转型对劳动报酬的影响机制

		(1)		(2)		(3)		(4)	
		<i>ls</i>		<i>gs</i>		<i>re</i>		<i>ls</i>	
<i>rp</i> × <i>ri</i> × <i>after</i>		−0.008*** (0.003)		−0.009*** (0.002)					
<i>rp</i> × <i>ri</i> × <i>after</i> × <i>cs</i>								−0.020*** (0.007)	
<i>gs</i>						−0.386*** (0.002)		−0.212*** (0.002)	
<i>cs</i>								−0.423*** (0.002)	
<i>ls</i>									
<i>size</i>		−0.022*** (0.000)		−0.004*** (0.000)		0.004*** (0.001)		−0.022*** (0.000)	
<i>dar</i>		0.008*** (0.001)		0.001*** (0.000)		−0.003*** (0.001)		0.006*** (0.000)	
<i>roa</i>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企业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的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的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 137 577		1 137 577		1 137 577		1 137 577	
<i>R</i> ²		0.188		0.151		0.181		0.232	
假设检验	变量	<i>rp</i> × <i>ri</i> × <i>after</i>	−.007 (0.012)	<i>rp</i> × <i>ri</i> × <i>after</i>	−0.003 (0.004)			<i>rp</i> × <i>ri</i> × <i>after</i> × <i>cs</i>	−0.003 (0.005)
	样本量	399 406		399 406				399 40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 10% 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5% 置信区间显著,***表示 1% 置信区间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1 中 3 式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份额对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之和影响显著为负,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份额每减少一个单位,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之和平均增加 0.386 个单位。这是由于收入分配过程中政府份额的减少让出了一部分企业经营成果,使劳动和资本要素能够分得更多经营成果,反映了增值税转型对资本和劳动的整体福利。根据 2 式和 3 式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增值税转型的收入效应即假说 1 成立。

4 式的回归结果表明,不仅资本份额与劳动份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增值税转型显著降低了资本份额对劳动份额的相关性,资本份额对劳动份额的系数绝对值升高,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改革使资本份额对劳动份额的负面作用平均显著增大了 0.020。

这种结果可能是两种作用导致,一是增值税改革导致了企业倾向使用更多的资本要素而使用较少的

劳动要素,即只是数量上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相对增加,资本名义价格不变化,导致劳动份额相对资本份额降低;二是不仅数量上资本要素对劳动要素相对增加,而且资本市场需求上升造成资本品名义价格上升,从而使得劳动相对资本的价格下降,从而造成劳动份额相对资本份额下降。两种情况中企业都用更多资本替代劳动。

由 1 式和 2 式的回归结果可知,增值税转型造成了劳动份额和政府份额同时下降,根据收入分配三方的此消彼长关系,可知转型中企业资本份额在上升,证明增值税转型对劳动份额和资本份额的影响是不对称的,增值税转型中政府的税收减少具有要素偏向性的,结合表 1 中 4 式的回归结果,假说 2 得证。

即使改革中政府份额的下降有利于劳动份额的上升,根据 1 式的回归结果,劳动份额最终下降,表明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效应大于政府对劳动的收入效应,证明了假说 3。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资本投资存在

强力的激励,这种激励基于企业投入要素成本的变化,转型降低了资本的实际价格而没有降低劳动价格,资本价格相对于劳动价格下降,促使企业有极大的动机进行资本的投资而非劳动的投资,加剧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增值税改革的福利更加惠及资本所有者,对劳动所有者不但没有益处,反而会由于引发资本对劳动过度的替代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下降。

4.2 稳健性检验

要使 DDD 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无偏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假设没有发生政策变化,那么控制组和实验组的变化趋势相同,即满足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因变量上的差异完全是增值税转型导致的。为了检验模型是否满足以上条件,本文进一步检验了两组企业的劳动份额在试点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假设检验中,我们只保留数据中 1999 年至 2003 年的观测值,假设东北地区相应行业的增值税转型发生在 2001 年,令 2002 年和 2003 年的 *after* 变量为 1,1999 年至 2001 年的变量 *after* 为 0,其他变量意义都不变,然后重新估计模型 1,如果变量 $rp \times ri \times after$ 不显著,则证明两组企业在增值税转型试点前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两组企业可以进行比较。

表 1 最下面一行的假设检验结果报告 $rp \times ri \times after$ 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模型满足 DDD 方法估计的条件。参照以上思路,我们也对模型 2 和模型 4 进行了假设检验,表 1 的最下面一行报告了假设检验的结果,说明模型 2 和模型 4 仍然满足 DDD 方法估计的条件。

5 结论与启示

增值税转型是我国近年来财税改革的重大事件^[11],从试点、全国推广已经历时十多年。本文利用 2004 年东北三省增值税转型试点的“自然实验”利用 1999—2007 年中国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使用面板三重差分模型从实证中揭示了增值税改革对劳动份额的作用机制。首先增值税转型引起政府份额下降,政府份额的缩小会引起劳动份额、资本份额总和的增加,但是由于增值税转型激励企业相对劳动要素使用更多资本要素,单位资本份额的提高减少更多的劳动份额,并且超过了减税对劳动份额的提升作用,最终导致劳动份额下降。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政策的实际实施过程中,政府增值税转型在减轻工业企业的税收负担、

扩大工业企业生产力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对于劳动报酬份额有一定的负面作用,不利于缓解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深究其原因,这种政策的减税效果是非中性的,这种非中性来源于消费型增值税产生的资本要素消费优惠,这种价格扭曲会激励企业用资本投入代替劳动投入,从而劳动者更难得到政府减税的好处。如果对企业使用中性的减税策略,使政策以同等程度惠及劳动所有者和所有者,其经济效果或许更好。

在当前收入差距较大的国情下,政府应该适当关注增值税改革对劳动份额产生的负面作用。中国已经迎来了第二次重大的增值税改革“营改增”,“营改增”极有可能通过同样的作用机制对劳动份额造成影响,对于增值税改革对劳动报酬的影响,不仅需要认识其最终的影响方向和程度,还需要对其作用机制有一定认识,以提高政策评价的全面性。

参考文献

- [1] 马霞. 国际贸易、要素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现代管理科学, 2015(8): 60—63.
- [2] 臧旭恒, 贺洋. 初次分配格局调整与消费潜力释放[J]. 经济动态, 2015(1): 19—28.
- [3] 聂辉华, 方明月, 李涛. 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例[J]. 管理世界, 2009(5): 17—24.
- [4] 陈烨, 张欣, 寇恩惠, 刘明. 增值税转型对就业负面影响的 CGE 模拟分析[J]. 经济研究, 2010(9): 29—42.
- [5] 石光, 岳阳. 增值税转型和初次收入分配[J]. 劳动经济研究, 2016(1): 65—88.
- [6] 申广军, 陈斌开, 杨汝岱. 减税能否提振中国经济? ——基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16(11): 70—82.
- [7] NISSIM B.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effect on income distribu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2007(1): 42—58.
- [8] CHEN Y, HE Z, ZHANG L. The effect of investment tax incentives: evidence from China's value-added tax reform[J].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11(3): 69—81.
- [9] LIN S. Taxation,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The Japanese Economic Review, 2001(2): 185—197.
- [10] 付明卫, 叶静怡, 孟侯, 希雷震. 国产化率保护对自主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风电制造业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5(2): 118—131.
- [11] 高培勇. 新一轮税制改革评述: 内容、进程与前瞻[J]. 财贸经济, 2009(2): 5—12.

The Medium That Added-value Tax Reform Influences Labor Share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DD model of the panel

XIE Hong-jun, MU Jia-ying, LI Yang-w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1320,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date of China Annual Survey of Industry ,this paper employs the DDD model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added-value tax reform in corporation. The results are follows: added-value tax reform reduces labor share significantly; added-value tax reform reduces government share significant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dded-value tax reform influences labor share in two way. Firstly,added-value tax reform reduces government share. The decline of government share increase the sum of laborshare and capital share; Secondly,Because more capital substitute for labor,the increase of capital share reduces labor share. Labor share decreases finally on account of the second effect being greater than the second effect. this paper supplements the experience of added-value tax reform, for refrence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lue-added tax.

Key words:added-value tax reform;labor share;DDD model;primary income distribution

(上接第 64 页)

[45] 齐丽云,张碧波,郭亚楠. 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认同对购买意愿的影响[J]. 科研管理,2016,37(5):112—121.

[46] 张川,娄祝坤,詹丹碧. 政治关联、财务绩效与企业社会责任——来自中国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J]. 管理评论,2014,26(1):130—139.

[47] 肖海林,薛琼. 公司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J]. 财经问题研究,2014(12):91—98.

[48] 冯丽艳,肖翔,赵天骄. 经济绩效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J]. 管理学报,2016,13(7):1060—1069.

[49] 阮丽暘,王良,刘益. 外部环境因素对小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J]. 软科学,2016,30(5):69—73.

[50] 张洪利,张若楠,刘晓红. 新常态下服务业企业社会责任归因实证研究[J]. 经济纵横,2016(8):51—54.

[51] 邹鹏,苟晓霞,PHILIPPA. 基于价值链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价值的影响[J]. 管理科学,2015,28(1):32—46.

A Differentiation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Size and Organizational Cost on the Investment Emphasis on Differ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LI Jian¹, SUN Hai-yao¹, PU Xiao-min²

(1.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with the help of organizational cost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irect impact of company size on stakeholders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roducing social expectation as an intermediate variab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company sized on the amount of input in different stakeholders. Referring to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data of 384 listed company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s paper Using SmartPLS software to construct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o make an empirical analysi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company siz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ompany’s stakeholders except the employees; Under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expectation, company size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and the community problems, and social expectation plays a full role as a intermediary. The results of this paper will help enterprises to formulate reasonable schemes in the process of fulfilling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n line with their own size;and conducive to the Govern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related policies, the scale of the enterprise will b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firm size;organizational cost;stakeholders;social expectation